

中国钱币丛书甲种本之二十五

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

王永生 著

中华书局

《中国钱币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戴志强

主 编 黄锡全 姚朔民

副主编 顾 青 金德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永生 王贵忱 叶世昌 华觉明 汪圣铎

吴荣曾 周卫荣 金德平 姚朔民 顾 青

高聪明 黄锡全 裘锡圭 戴志强

《中国钱币丛书》编辑缘起

近年来,随着我国钱币收藏、研究活动的日趋繁荣活跃,广大读者对钱币学著作的需要也日益提高。读者既需要高水平的研究著作,也需要深入浅出的普及性读物。为了适应这种形势,中国钱币学会准备编辑一套反映当代钱币学水平的《中国钱币丛书》,中华书局也拟出版面向广大读者的“钱币丛书”。在这个基础上,双方协议合作,并邀请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共同编辑出版《中国钱币丛书》,以飨读者。

《中国钱币丛书》分甲种本和乙种本两种:甲种本为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力争反映当代钱币学的研究成果。乙种本为高质量的普及性读物,力争融学术性、知识性于一体,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中国钱币丛书》的编辑,尚无经验,在构思选题以及其他方面,必然还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我们诚恳地期望泉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合作与支持,以便能把它办得更好,更能反映当代的学术水平,更能适合广大读者的需要。

《中国钱币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3年4月

序

钱币,又称古钱币或历史货币,一般指退出流通领域的货币。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钱币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更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见证以及各个时代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的缩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传统的古钱学“就钱论钱”开展研究,所编著的各式图谱多是专注于对钱币版别、尺寸、重量、图纹等的描述。实际上,钱币背面蕴藏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反映着不断变革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因此,我曾多次强调我们的钱币研究工作应注意克服这种不足,不但要研究钱币本身,更要研究钱币背后所蕴涵的社会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历史,及其对当时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工作要有新的发展和创新,要注意拓宽领域,增加深度,提高层次。应该说这一指导思想近年来在各级钱币学会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落实,钱币研究面貌已有了很大的改观,我们有许多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其中由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王永生同志撰写的《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

《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是王永生同志继 2007 年出版《新疆历史货币》一书之后完成的又一部学术专著,全书由“钱币考证”、“钱币文化研究”、“清代新疆铸钱局研究”以及“附录”和“钱币彩图”组成,收录了作者近二十年来撰写的 34 篇论文。主要涉及古代西域以及近代新疆和西藏地区铸造和流通的货币。坦率地讲,书中所讨论的许多问题非我所长,是否有重要发现或深入分析,需由专业人士进行评判。但是,作者的研究不限于钱币本身,而是通过对钱币的考证来对那些历史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则是我认可的。如:

《波斯伊利汗国仿行元朝钞法》首次论述了元代蒙古人在伊朗建立伊利汗国时曾模仿元朝纸币制度于 1294 年发行了波斯纸币。这是我国古代纸币文化及印刷技术传入中亚,并进而传入欧洲的明确记载,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以至波斯语中至今仍将纸币称作 Chao(钞)。

《色章郭木金币考》是作者在 1992 年受命草拟为中国人民银行答复全国人大、外交部、国家民委、统战部等部委来函询问发行“色章郭木”金币纪念章复函的基础上完成的。通过考证,证明该金币不但和“藏独”毫无关系,而且是 20 世纪初西藏地方政府为抵御英国殖民主义侵略势力的日益渗透而铸造发行的,澄清了这个历史问题。

《“高昌吉利”钱币考》首次指出铭文“吉利”并非来自汉语“大吉、大利”或“吉祥如意”,实为突厥语 ilik 或 ilig(汉译为“王”)的汉语音译,即突厥语官衔“吉利发”,这是西突厥册封高昌王的封号。作者认为这种用汉字拼读突厥语的现象与当时高昌地区特有的民族构成及其

文化特点有关:高昌王国内部是由汉族移民带来的农耕文化,而环绕王国四周的是以突厥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两种不同类型文化的相互影响,形成了以“汉、胡交融”为特色的高昌文化。“高昌吉利”钱币正是这种文化交融的具体表现,作者据此分析了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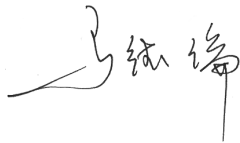
《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根据新疆考古新发现,第一次明确论证了自宋代以来就成为不解之谜的两种唐代钱币“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实际上是在安史之乱后坚守西域的唐代安西都护府守军在大历、建中年间于安西(今新疆库车)铸造的,属于最早的军用货币。流通使用范围仅限于当时安西守军主要控制范围,即新疆库车及其附近地区,主要供驻军使用。借助出土钱币所提供的线索,作者还就上元元年(760)以后唐朝在西域的坚守情况及吐蕃攻取西域的路线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

《“东突”分裂势力铸造(印制)钱币考》、《民国新疆两种未发行(流通)纸币考》,则通过对民国时期“东突”分裂分子印制的钱币,以及图谋利用在民国政府发行的纸币上翻译维吾尔文时乘机宣传“东突”分裂思想阴谋破灭的考证,揭示了“东突”分裂思想的欺骗性及其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的危害,从而说明“东突”分裂思想是新疆稳定的现实威胁以及与之斗争的复杂性。

《俄国及前苏联在新疆铸行钱币三考》揭露了近代沙皇俄国在经济上对新疆进行的野蛮侵略和无耻掠夺以及民国初年苏联一贸易公司在新疆私铸银元宝而引起的两国间一段鲜为人知的有关“币政主权”的外交交涉。

《伊帖、阿尔泰通用银券考》通过对“伊帖”和“阿尔泰通用银券”两种纸币的考证,讲清了原由民国中央政府直辖的伊犁和阿尔泰地区行政上归属新疆省管辖,新疆最终实现全省行政统一的过程。

书中还有很多论述和观点,读者可以自己去分析、评判。我希望我们的钱币研究工作者既要研究钱币本身,也能够从钱币的背面去挖掘它所蕴涵的更深层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内涵。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研究钱币的意义所在,也真正体现了“古为今用”。借王永生同志《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出版之际,将我关于钱币研究的观点再次陈述一遍。



2008年11月29日

(马德伦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中国钱币学会理事长)

第一部分 钱币考证

“高昌吉利”钱币考

——兼论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

“高昌吉利”为圆形方孔铜钱，系浇铸制成。正面为汉文隶书“高昌吉利”四字旋读，背面无文。钱体大而厚重，文字古朴，肉好郭圆，制作精良，直径 25.5 毫米，穿 7 毫米，重约 14.3 克(图 A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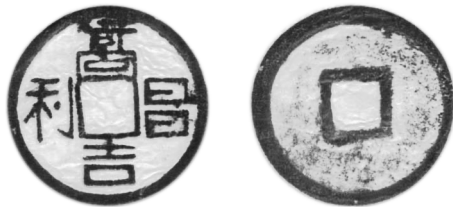


图 A1-1 高昌吉利

关于“高昌吉利”钱币的最早载录，目前所知见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张敬庵所著《泉宝录》。据道光、咸丰年间张崇懿著《钱志新编》所引《泉宝录》记载：“高昌钱光幕，钱极厚重，乃高昌国所铸，未知出于何代。”^①根据该钱币历年出土发现，除一枚在西安何家村出土外，其余几乎全部都发现于古代称做“高昌”的新疆吐鲁番地区，且钱文中铸有“高昌”两字，因此，自乾嘉以来钱谱著录均断定其为古代高昌国所铸。这一推断钱币学界基本没有疑义，分歧主要集中在断代上，自北魏至元代，莫衷一是。关于钱文中的“吉利”两字，后世学者更多是从字意上直观地解释为大吉、大利，即具有祈福、吉祥的意思，因而认定“高昌吉利”钱币属于吉语钱。客观地讲，这种理解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思路在解读“高昌吉利”钱币上，却是陷入了一个误区，因为“高昌吉利”四字中的“吉利”两字，虽然是汉字，但拼读的却是古突厥语，其对应的汉语意思完全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

本文将从考释汉字“吉利”所拼读的古突厥语对音入手，结合高昌国历史的演进，以及当时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与西域地区的突厥等游牧文化在高昌地区相互交融的背景，就“高昌吉利”钱币铭文的语义、铸造背景、年代及其性质做一考证，并在此基础上，试就隋唐之际高昌

^① 张崇懿《钱志新编》卷十九《外夷》，1989年9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民国刊本影印。翁树培《古钱汇考》引刘燕庭语，“余藏有高昌吉利钱一枚，为仁和吴我鹄所赠。《泉宝录》以为高昌国钱，容或然也”。同治年间，李佐贤《古泉汇》录一钱拓。

地区的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谈谈看法。

一、“高昌吉利”钱币的发现及研究状况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高昌吉利”钱币,已知的约有 50 枚左右(详见表 1)。其中,除两枚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经正式考古发掘所得,能够明确断定年代外,其余都是传世品或从民间采集所得。因此,自清代乾嘉以来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外钱币学界关于“高昌吉利”钱币的研究文章不下二三十篇(详见表 2),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多都属主观推断,拿不出具有说服力的依据。仅关于“高昌吉利”钱币的铸行年代,就能概括出如下五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1. 北魏说 以郑家相、王琳及英国的克力勃(M. R. Joe Cribb)等为代表。依据是“高昌吉利”四字为隶书,具北魏风格。高昌曾接受北魏册封,互有往来,受北魏影响而铸此钱^①。

2. 隋朝说 以卢健生、邹志谅等为代表。依据是隋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征吐谷浑到达河西,高昌国王麴伯雅曾亲往会见并随行到中原,娶隋华容公主,受册封而回。归国后即“解辫削衽”实行服饰改革,推行汉化政策。铸“高昌吉利”钱币以为纪念^②。

3. 唐朝说 普遍持此说,以陈尊祥、盛观熙、周昆宁、蒋其祥、杨鲁安等为代表。依据是唐贞观四年(630)高昌国王麴文泰曾偕妻赴长安朝觐,受太宗隆重接待,赐其妻李姓并封长乐公主。“高昌吉利”钱币当为纪念此事而铸,或以为太宗铸行赏钱的可能性更大,可能铸于古都长安附近^③。

4. 五代十国说 以彭信威为代表,依据是“(‘高昌吉利’钱币)文字制作有点像刘燕的永安铜钱”。因此,他认为“年代最早只能看到五代十国,看不到南北朝或隋唐”^④。

5. 元朝说 以丁福保、黄文弼及日本的奥平昌洪和荷兰的易仲廷(Dr. TjongDing Yih)等为代表。认为“以高昌题名,必为高昌建国时代所铸。但以高昌国为国号或王号者,有两时期,一为麴氏建国时期……一为元朝……此钱或系十四世纪初期所铸也。其体制亦类元钱。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附于元钱之末,疑是”^⑤。

关于“高昌吉利”钱币的性质,更有正式行用钱、纪念币、压胜钱、随葬用的冥钱等不同观

① [英]克力勃《有魔力的中国钱》,载《内蒙古金融》1986 年专辑。王琳《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钱币》,载《中国钱币》1987 年第 2 期。

② 卢健生《高昌国与高昌吉利古钱疑补》,载《内蒙古金融》1985 年专辑。邹志谅《高昌吉利钱研究》,载《苏州钱币》1986 年总 2 期。

③ 陈尊祥《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钱币研究》,载《中国钱币》1984 年第 3 期。周昆宁《高昌国与高昌吉利古钱》,载《内蒙古金融》1985 年第 2 期。盛观熙《再论“高昌吉利”钱》,载《新疆钱币》增刊 2004 年第 3 期。蒋其祥《新疆古代钱币的发现与研究》,载《舟山钱币》1990 年第 3 期。杨鲁安《新出高昌吉利钱考》,见 2001 年部分城市钱币研讨会交流文章。

④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30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年。

⑤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1954 年刊载于中国科学院《考古学专刊》第 3 号。另,[日]奥平昌洪《东亚泉志》(昭和十三年 1939 年东京岩波书店发行)卷十一第 67 页记:“此钱系于古之高昌国,然其形制有元钱之风,当为元代高昌之地(在新疆镇西府之西部)之物,故今附于元钱之末。”

点;关于铸造地点也有铸于高昌本地和铸于中原内地两种不同说法。

在“高昌吉利”钱币的研究上,20世纪70年代初的两次考古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一次是1970年10月在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出土千余件各类文物,在36枚历代古钱币中,发现有一枚“高昌吉利”钱(彩图1)。郭沫若考证为安史之乱后邠王李守礼后人所窖藏^①。另一次是1973年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和西北大学历史系联合考古队在吐鲁番阿斯塔那进行考古挖掘时,在保存完好的编号为519号的张隆裕妻麹文姿墓葬中,出土了一枚“高昌吉利”钱(彩图2)，“此钱出土时,压于死者尸体之下,未经盗扰触动”^②,保存完好。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块唐贞观十六年(642)的墓志。

两次考古发掘各出土一枚“高昌吉利”钱币,特别是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编号为519号的墓葬中同时出土的纪年为唐贞观十六年(642)的一块墓志,非常重要。因为它为“高昌吉利”钱币的断代提供了科学依据,即“高昌吉利”钱币的最晚铸造时间不可能晚于唐贞观十六年,也就是公元642年。由此否定了此前以彭信威先生为代表的五代十国说,以丁福保、黄文弼、奥平昌洪等为代表的元朝说。自此,钱币界基本认定“高昌吉利”钱币为高昌王国时期所铸。

高昌建国实际上应从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沮渠无讳取代阚爽,占据高昌称大凉王开始算起^③,到唐贞观十四年(640)麹智盛投降唐朝,高昌被改设为西州止,共历时198年。期间因柔然、高车、铁勒、突厥等外来游牧势力以及中原王朝的干涉,高昌王国曾先后经历了北凉沮渠氏、阚氏、张氏、马氏以及麹氏等统治时期。其中张氏、马氏统治时间很短,局势亦不稳定。麹氏统治时间最长,约有140年,历经十王、九世。“高昌吉利”钱币具体是在何时,由哪位高昌王因何而铸,则仍是众说纷纭。要解决这一难题,只能从解读一直被大家所忽视而实际上却非常重要的“吉利”两字入手。

二、“高昌吉利”钱文语义的考释

“高昌吉利”四字虽然都是汉字,但其所表达的寓意却是不同的,完全不能简单地按照汉字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和推测,因为这里汉字所拼读的是古突厥语,而不是字面上的汉字意思。

“高昌”在这里是指地名,位于吐鲁番城东约40公里处。据伯希和考订为突厥语 qočo 或 Khočo 的对音,这两个名称在上世纪初德国探险家从吐鲁番收集的突厥文写本中均有发

① 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见陈尊祥《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钱币研究》,载《中国钱币》1984年第3期。

② 《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刊《文物》1975年第7期。另收《新疆考古三十年》11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③ 关于高昌建国的开始,文献记载与学者研究存在分歧。《北史·高昌传》3212—3213页(中华书局,1988年)明确记载和平元年(460)“蠕蠕(柔然——引者注)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其称王自此始也”。但冯承钧、侯灿、荣新江等认为应从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沮渠无讳取代阚爽,占据高昌称大凉王开始算起。

现^①。另据汉文献记载,“高昌”之称最早见于《汉书·车师传》^②,其得名是因为“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③。北魏人阚廌在《十三州志》记“高昌壁,故属敦煌”,这里的“故”,唐长孺先生认为“当指东汉”^④。王素根据出土文书记载西汉敦煌县已有高昌里,因此认为“高昌”之名应来自于敦煌县高昌里派出的屯戍士卒^⑤。此说成立,这与伯希和的考订实际上并不矛盾,只不过吐鲁番所出突厥语文写本中 qočo 或 Khočo 应是译自汉文“高昌”,只是伯希和将其关系给弄颠倒了而已。汉代在高昌设“戊己校尉”实行屯田,因建壁垒,称高昌壁。西晋始设郡,称高昌郡。北魏和平元年(460)在柔然支持下建立高昌国,高昌即为王城所在地,也就是今天新疆吐鲁番地区的哈刺和卓城(Karakhoja)。《高昌契氏家传》就明确记有“高昌今哈刺和卓也”。但民间则习惯将哈刺和卓城称做高昌故城,位于今吐鲁番市东约 40 公里处^⑥。



高昌故城遗址

“吉利”应为突厥语 ilik 或 ilig(即“王”)的汉语音译。据著名的古代突厥语言学家张铁山教授研究,突厥语 ilik 或 ilig 第一音节的 i 可对应音译为汉字“吉”的音,如 iltäbir 音译为颡利发或俟利发;ilteriç 音译为颡跌利施或颡俟施;irkin 音译为颡斤或俟斤。il 既可音译为伊利、乙利或意利,也可音译为颡利。ilik 或 ilig 的第二音节 lik 或 lig 显然与汉语“利”的读

① 冯承钧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77 页,中华书局,1982 年。

② 《汉书·车师传》有车师王“驰突出高昌壁”一句。

③ 《魏书·高昌传》2243 页,中华书局,1974 年。

④ 唐长孺《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载《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

⑤ 王素《高昌得名新探》,载《西北史地》1992 年第 3 期。

⑥ 唐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高昌国后设西州。宋元时期为高昌回鹘国。《辽史》又称为和州回鹘,《金史》、《长春真人西游记》均讹译为和州,《元史》及《明史》因此又译为哈刺火者、和州、火州等。

音是对应的^①。因此,汉字“吉利”实际上就是突厥语 ilik 或 ilig 的音译,汉籍一般译做“颉利发”或“颉利”。

据《旧唐书·突厥传下》记载,“颉利发”是突厥汗国的一种官衔或称号。西突厥在著名的统叶护可汗时,“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②。即将颉利发授予被突厥控制的西域各国国王,作为臣服的标志。高昌、龟兹等国国王都曾接受过颉利发的称号。

王国维先生考证认为,“颉利发”这一官衔或称号,如同可汗、可贺敦一样,都源自于柔然,后被突厥沿用^③。

韩儒林先生研究认为,“‘颉利发’之外,尚有俟利发、俟利伐、俟利弗、俟列发、希利发等异写,而‘颉利’则又有伊利、一利、意利、伊离等异文”^④。

实际上,“吉利”就是颉利发或颉利的异译,都译自突厥语 ilik 或 ilig,为突厥语“王”的汉语音译。

由以上考证,可知“高昌吉利”钱币上的铭文“高昌吉利”四字是用汉字拼读的古突厥语,意为高昌王。这是汉语和突厥语相互交融的结果,是高昌国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及其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三、高昌历史沿革及麴氏王朝梗概

在讨论“高昌吉利”钱币之前,有必要先就高昌的历史沿革以及麴氏王朝梗概做一简单叙述。

(一)高昌历史沿革

历史上的高昌,一般可概括分为高昌壁、高昌郡及高昌国三个时期。

高昌最初为汉代车师前部故地。车师的前身是姑师,元封三年(前108),被汉军击破,余众向北投靠匈奴,在博格达山南北形成车师国,分为前、后两部。后部位于天山北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一带;前部则位于天山南部的吐鲁番盆地。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管理屯田事宜^⑤。因屯田而筑壁垒,故又称高昌壁。这一时期汉朝为

① 参见岑仲勉《突厥语及其相关外语之汉文译写的考定表》,载岑仲勉著《突厥集史》下册,1125页,中华书局,2004年。十多年前,笔者就曾猜测“吉利”两字应来自突厥语,可能与“颉利发”或“颉利”有关。前不久,笔者去看望中央民族大学突厥语言学教授张铁山博士时,特意向他请教,经其从语言学上考释,终被确认。

② 《旧唐书·突厥传下》5181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③ 王国维《高昌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跋》曰:“自突厥崛起,高昌常为所役属,故其君相皆受突厥官号。……诸王或首领,皆有俟利发或颉利发号,盖突厥于其所属之国,皆授其王或首领以己国官职。……然俟利发一语,疑本出蠕蠕。突厥主称可汗,后称可贺敦,皆袭蠕蠕旧号,俟利发亦然。魏书蠕蠕传,阿那环族兄有俟力发示发,从父兄有俟力发婆罗门。突厥后起,故沿以为官号。”见《观堂集林》卷二十,987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④ 韩儒林《突厥官号研究》,载《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0年第1卷第1号。

⑤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华书局,1975年。

控制西域,而与匈奴在高昌地区展开了被称为“五争车师”的激烈争夺^①。

高昌设郡是由前凉统治者张骏完成的,西晋咸和二年(327)张骏在平定了戊己校尉赵贞的叛乱后,鉴于这里居民主要都是来自内地的移民,其生产方式及生活习惯与内地完全相同,因此设立了郡县。高昌郡下设高昌、田地两县,县下设有乡、里,形成了完整的郡、县、乡三级地方政权,使高昌由一个戊己校尉管理的半军事化的屯田基地,一变而成为了高昌郡的行政机构。这不但改变了高昌的地位,同时也是第一次将郡县制度推广到了西域地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高昌建国传统观点认为始自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北史·高昌传》记载:“太武时有阚爽者,自为高昌太守。……和平元年,为蠕蠕(即柔然——引者)所并。蠕蠕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其称王自此始也。”实际上,高昌建国应从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沮渠无讳取代阚爽,占据高昌开始算起。因为当时沮渠无讳虽然没有称高昌王,而是称大凉王,但建立的却是国家政权组织。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高昌建国首先需具备一个王国的体制,这个体制并非高昌所固有,而是由沮渠氏从河西直接带来的。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在柔然支持下,沮渠安周驱逐了亲北魏的车师前部残余势力(居交河城)^②,统一吐鲁番盆地,奠定了历时将近二百年之高昌国之规模。

柔然于沮渠安周承平十八年(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攻陷高昌,杀安周,沮渠氏的高昌政权历经18年而灭亡。柔然扶植了傀儡阚伯周为高昌王,从此高昌历史进入了称王的时代。

柔然扶植的阚伯周是否与18年前兵败后逃奔柔然的阚爽有血缘关系,史无记载,不得而知。但阚伯周完全忠实于柔然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在其执政的二十多年里,未见朝贡北魏的记载。阚伯周死后,其子义成继立,当年就被从兄首归所杀。阚首归自立后执政10多年,于北魏太和十五年(491)被新兴的高车王阿伏至罗所杀^③,阿伏至罗立敦煌人张孟明为高昌王。5年后,国人杀高车扶植的张孟明,另立马儒为王。第二年,马儒便遣使北魏奉表朝贡,甚至请求举国内徙。这一明显过分的亲魏姿态自然招致了高昌国内土著大户们的反对,致使马儒于上台三年后即太和二十三年(499)被杀,麴嘉被立为高昌王。高昌历史进入了麴氏王朝统治时期。麴氏王朝初立之时,正值柔然与高车争夺西域的控制权,所以麴嘉执政后即称臣于柔然,15年后,当柔然可汗伏图被高车所杀后,麴嘉又随即称臣于高车。永平元年(508)还遣使朝贡过北魏^④。麴嘉的后继者继承了这种向外称臣的政策,后来兴起的铁勒、突厥都是其宗主国。因此,高昌王国自麴氏王朝开始,虽然国力弱小,但是,因为能灵活地周旋

① 车师地区为西汉屯田重点,也是控制西域的关键,从武帝天汉二年(前99)开始,直到宣帝神爵二年(前64),匈奴内乱,负责西域事务的日逐王降汉,汉朝才最终控制这一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郑吉被任命为第一任都护。

② 《魏书·车师国传》2264页,中华书局,1974年。

③ 《魏书·高昌传》记此事于太和五年,《资治通鉴》记为齐高帝建元三年,均为481年。但据冯承钧考证,太和五年高车尚未西迁,高车王阿伏至罗不可能杀阚首归,应是太和十五年(491)之误(见《高昌事辑》,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63年)。

④ 《魏书·高昌传》2244页。

于周边强大的外部势力之间,获得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发展时期^①。

(二) 麴氏王朝梗概

麴氏王朝的统治共有 140 年,是高昌王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也相对最稳定的时期,具有重要地位。但文献记载却非常零散,在吐鲁番已出土发现的文书及墓砖资料中,关于麴氏王朝资料的数量虽然仅次于唐西州时期资料的数量^②,但其中有关历史的记载却非常稀少,且语焉不详,成为研究中的一大难点。自罗振玉、王国维等以来,经数代学者的努力,麴氏高昌王国的世系目前已基本理清。

高昌麴氏王国的第一代国王麴嘉,原是马儒当国时的右长史,在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9)国人杀马儒后被拥立为王。到唐贞观十四年(640)麴智盛降唐,高昌被改设为西州止,麴氏王朝共立国 140 年,传十王、九世。其世系及年号分别为:麴嘉(承平、义熙)、麴光(甘露)、麴坚(章和)、麴玄喜(永平)、麴□□(和平)、麴宝茂(建昌)、麴乾固(延昌)、麴伯雅(延和、重光)、麴□□(义和)、麴文泰(延寿)、麴智盛(详见表 3)。

十位高昌王中,有两位只有年号而不知名。其中,在位时间最长的是第七代高昌王麴乾固,共历 41 年。但最为知名的却是麴嘉、麴伯雅和麴文泰三位,都留下了谥号,分别是昭武王、献文王和光武王。麴嘉是众所周知的麴氏王朝开国之王,而麴伯雅与麴文泰父子的出名,则是因为他们在位时曾发生了对高昌王国晚期历史影响深远的“义和政变”及随后的“重光复辟”和“延寿改制”。

据《张雄夫人麴氏墓志》记载,“义和政变”发生于 614 年^③,是王国上层为反对麴伯雅推行服饰改革而策划的一场宫廷政变。高昌因“国处边荒,境连猛狁”,致使在生活习俗和服饰上受游牧民族影响,披发,上衣左侧开襟,即所谓“被发左衽”,被隋炀帝指责为“数穷毁冕,剪为胡服”^④。隋大业五年(609)六月隋炀帝征讨吐谷浑到达河西时,麴伯雅携带王子文泰前去朝觐,随杨广东归,游历了长安、洛阳,并同征高丽。在中原逗留三年多^⑤,并娶隋华容公主。此次东游,麴伯雅目睹了隋朝的强大,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强大吸引力,遂产生了摆脱铁勒控制,归向隋朝的想法。归国后便推行服饰改革。发布告示,全文如下:

夫经国字人,以保全为贵;宁邦缉政,以全济为大。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连猛狁,同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

① 另以高昌为国号或王号的,还有 840 年漠北回鹘汗国溃散后,一支西迁回鹘建立的高昌回鹘王国亦都护政权。因超出本文所讨论范围,兹不赘述。

② 自 1959 年至 1975 年,考古工作者共进行了 13 次大的挖掘,挖开了 459 座古墓,在 119 座墓中发现了文书。在 1586 份汉文文书中,有 403 份断代为麴氏王朝统治时期,1020 份为唐朝西州时期。见《中亚文明史》第 3 卷,第 12 章“高昌”257—266 页(张广达执笔),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 年。

③ 吴震《麴氏高昌国史索隐——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载《文物》1981 年第 1 期。

④ 《隋书·高昌传》1846—1848 页,中华书局,1973 年。

⑤ 王素考证认为:“表面上,麴氏父子一同于大业五年六月入朝,又一同于大业八年冬返国,实际上,麴文泰使隋一次,麴伯雅使隋两次。其间,麴伯雅曾于大业六年二月或三月初返国,又曾于大业七年五月以后入朝。麴文泰在隋逗留近四年,而麴伯雅在隋逗留仅近二年。”参见《麴氏高昌“义和政变”补说》,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

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①

麴伯雅以华变夷,改变发式、服饰制度,向中原文化看齐的改革,获得了隋炀帝支持,“赐衣冠之具,仍班制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领将送”。希望高昌能够“被以采章,复见车服之美;弃彼毡毳,还为冠带之国”^②。但是,这一改革在实际推行的过程中却遇到了很多阻力,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距离高昌最近的另一宗主国铁勒的反对。《隋书·高昌传》记载,“虽有此令取悦中华,然竟畏铁勒而不敢改也”。即便如此,最终还是导致了政变发生,麴伯雅弃国逃亡。失国六年,公元620年才在西突厥的支持下重新夺回政权,改元重光,史称“重光复辟”。关于“义和政变”的幕后主使,史无记载,或主张铁勒,或主张隋唐^③。具体是谁似乎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中原汉文化与西域少数民族游牧文化,即所谓汉胡两种文化、两股势力对高昌的影响与争夺。

“重光复辟”四年后,即624年,麴文泰继承王位,改元延寿。为吸取教训,加强统治,麴文泰围绕强化王权推行了一些新的政策,史称“延寿改制”。限于资料,我们对延寿改制的内容所知有限,也不全面。但从目前所掌握到的一些具体事例上看,加强王权应该是其改制的中心目标。如:

1. 为强调自己“王”的地位及称号,在命妇制度上,麴文泰改变了其母亲与妻子的名号,不再称夫人而改称太妃和妃^④。

2. 在高昌官方文书中,引入了称臣制。官员上书开始称“奏”,署名时在职务之后加一“臣”字。麴文泰使用的印文是“奏闻奉信”(按:臣下上书皇帝称“奏”,皇帝回答臣下称“闻”)。这些已不仅是为了加强王权,麴文泰甚至开始自比中原皇帝^⑤。

3. 以重新给高昌城诸城门命名为由,使新城门“与汉长安城,魏、晋、北魏洛阳城,十六国时的姑臧城等同出一脉,基本上以天文、五行等为依据”^⑥。

正如孟宪实指出的,“这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增其旧制、锦上添花之举,实则是欲规模京城之制,体现出高昌城的王家气派,这才是麴文泰改建变易高昌城的真实企图”^⑦。

麴文泰“延寿改制”中,“越制无藩臣礼”的违制做法最终还是给高昌王国带来了灭顶之灾。唐太宗在《讨高昌王麴文泰诏》中指责“高昌麴文泰,犹为不轨,敢兴异图,事上无忠款之节,御下逞残忍之志”。太宗曾明确告诉高昌使臣,“明年我当发兵虏而国,归谓而君善自图”^⑧。但麴文泰不相信唐朝真会发兵,他认为“吾往者朝觐,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

①② 《隋书·高昌传》1846—1848页,中华书局,1973年。

③ “义和政变”及义和政权,一般认为得到了铁勒支持,但关尾史郎认为是亲隋势力发动的。参见关尾史郎《“义和政变”新释——隋、唐交替期高昌国·游牧势力·中国王朝》,载《集刊东洋学》1993年第70号。

④ 延寿十四年五月有一件麴文泰之女写经的题记《维摩诘经》卷下“大僧平事沙门法焕题记”中称父为“王父”或“父王”,称母为“妃母”或“王妃”,并提到“太妃”。见S.2838号文书。转引自孟宪实《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314页,齐鲁书社,2004年。

⑤ 可参阅孟宪实《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齐鲁书社,2004年。

⑥ 郑炳林《高昌城诸门考》,载《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⑦ 孟宪实《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316页。

⑧ 《新唐书·高昌传》6221页,中华书局,1975年。

有隋之比。设今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若发三万以下,吾能制之。加以磧路艰险,自然疲顿。吾以逸待劳,坐收其弊,何足为忧也”^①。因此,毫无准备。唐贞观十四年(640)当得知侯君集已率十五万大军逼近城下^②,原寄以厚望的西突厥欲谷设(即乙毗咄陆可汗)在属下叶护献可汗浮图城(即北庭)投降后,也惧而西走。麴文泰计无所出,发病而死,其子麴智盛投降,高昌国灭亡。这是自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万度归远征西域后,事隔两个世纪,中原王朝又一次出兵西域,在灭亡高昌麴氏王朝的同时也开启了西域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四、“高昌吉利”钱币铸造背景、时间及性质分析

由前面的考证及分析,我们知道“高昌吉利”四字是用汉字拼读的古突厥语,意为高昌王。这说明“高昌吉利”钱币只可能是在高昌建国也就是正式称王后铸造的。学术界基本认为,高昌建国实际应从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沮渠无讳占据高昌时开始算起。但是,在沮渠无讳及沮渠安周兄弟统治的十八年间是不可能铸此钱币的,因为他们都自称是大凉王^③,目标是要复兴沮渠氏的大凉政权(史称“北凉”),而不是要当高昌王。因此,他们即使铸钱也不可能是“高昌吉利”钱。

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柔然攻陷高昌,杀沮渠安周,扶植傀儡阚伯周为高昌王。此后的阚氏、张氏、马氏相继统治高昌,虽然都自称高昌王,即《北史·高昌传》所记:“蠕蠕(即柔然)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其称王自此始也。”但是,仔细分析,阚氏统治时期铸造“高昌吉利”钱币的可能性也不大,这是因为:

第一,阚伯周是柔然扶植的傀儡,是柔然势力在高昌的代理人,完全忠实于柔然,在其执政的二十多年里与代表中原王朝的北魏政权没有任何正式官方往来。因此,阚伯周仿照中原地区,用汉文铸造圆形方孔钱币的可能性不大,理由亦不充分。

第二,阚首归如同其伯父阚伯周一样,也属于柔然的傀儡。正因为完全忠实于柔然,才于北魏太和十五年(491)被与柔然争夺高昌控制权的高车王阿伏至罗所杀。因此,在其统治的十余年间铸造“高昌吉利”钱币也是不大可能的。

第三,阚伯周之子阚义成继位当年就被从兄阚首归所杀。高车杀阚首归后所扶植的张孟明以及高昌国人自己拥立的马儒都在北魏、柔然、高车等外部势力的激烈争斗中先后被杀,执政时间都很短暂,并处剧烈的政局动荡期,更不可能铸造钱币了。

因此,我们认为在442年至499年,即北凉沮渠氏、阚氏、张氏、马氏统治高昌的57年间是不可能铸造“高昌吉利”钱币的。“高昌吉利”钱币只可能铸造于此后相对比较稳定的麴氏

① 《旧唐书·高昌传》5293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② 据亲自参加此次军事行动并担任总管的姜行本留下的《姜行本记功碑》(见《金石萃编》)记载,唐军数量达十五万之多,而当时高昌总人口据《唐会要》卷九五《高昌》记有“户八千四十六,口三万七千七百三十八”,尚不足四万。因此,麴文泰背后,实际已控制西域的欲谷设,即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才是唐朝出兵真正的目标。

③ 21世纪初,德国探险队在高昌故城可汗堡旁的佛寺遗址中,发现了承平三年(445)的《凉王大沮渠安周功德碑》即是证明。

高昌王国统治时期。应该是在“重光复辟”后推行“延寿改制”的大背景下铸造的。

麹氏王朝后期,高昌王国周边的柔然、高车及铁勒等游牧民族政权逐渐被新兴的、更强大的西突厥汗国所替代,中原地区则是唐朝取代隋朝。“重光复辟”后,周旋于周边强大的外部势力之间的高昌王麹文泰,非常清楚高昌王国地处西突厥游牧政权与唐朝之间,自身国力弱小,既是西突厥的属国,又必须向唐朝称臣,两边都得照顾。同时,更关键的是,在王国内部他还须强化王权,加强统治。因此,他执政后推行了“延寿改制”,在加强王权这一目标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既能照顾现实,同时又内外有别的政策。因此,我们认为“高昌吉利”钱币就是麹文泰在这一背景下铸造发行的,属于其“延寿改制”政策的一部分。

首先,铸造发行寓意为高昌王的“高昌吉利”钱币,是麹文泰加强王权的需要。同时,也是其在王国内彰显王权的最好方式。

其次,在高昌王的称号中,“王”字借用突厥语“王”(即 *ilik* 或 *ilig*) 的汉字译音“吉利”两字,即采用“高昌吉利”四字的形表达“高昌王”的意,这既能在王国内强调自己“王”的称号,同时也符合西突厥所授“颉利发”这一官衔,对外又可给唐朝以交代,看上去还具有祈福、吉祥的意思。这样就达到了在王国内部及周边两个强大的宗主国之间,三方都能接受、满意并解释得通的效果。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我们在吐鲁番出土文书及碑刻中发现,麹氏王朝的统治者将西突厥所授颉利发的官衔与自称的高昌王是放在一起,并列使用的。如:

《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所记麹宝茂的署衔为:

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瓜州诸军事、侍中、瓜州刺史、西平郡开国公、西董、时多浮跌、无亥、希利发、高昌王。

麹氏王朝延昌三十九年(599)写经题记中有:

1. 大品经卷第十八

2. 延昌卅九年己未岁五月廿三日,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西平郡开国公、西近、时多

3. 浮跋、弥𪛗、伊离地、都卢悌、陀豆、阿跋、摩亥、希利发、高昌王麹乾固稽首归命常住三宝。^①(下略)

这里“希利发”是“颉利发”或“颉利”的异译。铸造钱币时,因受文字所限,颉利发遂被简略为“吉利”两字。“高昌吉利”四字既符合圆形方孔钱的铸造特点,同时又能充分表达麹文泰的心意,真是完美之至!

^① 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查所获汉文文书》。转引自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88页,文物出版社,1994年。一长串称号中,“西董、时多浮跌、无亥、希利发”及“西近、时多浮跋、弥𪛗、伊离地、都卢悌、陀豆、阿跋、摩亥、希利发”等都是突厥官职的音译。与中原地区译名虽然不尽相同,但字音是基本相近的。如西董或西近,中原译作俟斤;无亥或摩亥,译作莫贺;阿跋译作阿波等。

考虑到玄奘当年曾在高昌生活过一段时间,与麴文泰结为兄弟,两人有较长时间的密切交往^①。玄奘西行求法回到长安后,在其所著《大唐西域记》中,对沿途经过的阿耆尼国(即焉耆)、屈支国(即库车)等国使用的货币都有专门记述^②,而唯独对高昌国的货币不见记载,更无“高昌吉利”钱币的丝毫踪迹。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高昌吉利”钱币是在玄奘离开高昌后铸造的,即其铸造年代的上限,应该不会早于玄奘离开高昌的贞观二年(628)^③,而下限更不可能晚于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平定高昌。换言之,“高昌吉利”钱币应铸造于唐贞观二年到贞观十四年,即628—640年的12年间。这种推断与吐鲁番阿斯塔那519号墓葬中,和“高昌吉利”钱币同时出土的墓志纪年为唐贞观十六年(642)亦是一致的。铸造地点应该是在高昌当地,不可能铸于中原内地。

另外,据《旧唐书·突厥传下》记载,颉利发是西突厥著名的统叶护可汗授予高昌王的称号^④,而统叶护可汗和麴文泰生活在同一时期,两人关系很不错,麴文泰曾为玄奘西行印度写信求其提供帮助^⑤。联系这件事,我们似乎可以认为统叶护可汗在接待过玄奘后,按突厥的习惯授予麴文泰颉利发即王的称号。麴文泰为纪念此事而特意铸造了“高昌吉利”钱币。

“高昌吉利”钱币,大而厚重,重量基本都在十四五克左右,较同时期的开元通宝重2至3倍不等。更是同时期在库车、焉耆等地流通使用的小铜钱的十几倍不止。重量虽较小铜钱为重,但却仅有一种规格,而无等次上的区别。发现数量稀少,只有五十枚左右,且绝大多数没有流通磨损痕迹,制作又极为精整。因此,我们认为“高昌吉利”钱币肯定不是行用钱,应属于纪念币性质的吉语钱,用于赏赐或馈赠。

麴文泰采用这种打擦边球的变通办法来表达高昌王的意思,也实在是出于无奈。这是因为高昌王这一称呼,从来都是高昌执政者的自称,而不是中原王朝对他的正式册封。正如《魏书·高昌传》所明确记载的“私署王如故”,这里“私署”两字,便表明了中原王朝对其称王是不予承认的。我们在遍查中原王朝对高昌历任国君的册封名号时,也仅发现北魏曾将麴坚的爵位由伯晋为郡王,除此之外,余皆或公或伯,更无一人被封为王。

①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孙毓堂、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玄奘是在麴文泰的盛情邀请下,改变行程来到高昌的;“法师意欲取可汗浮图过,既为高昌所请,辞不获免,于是遂行。”麴文泰本想留玄奘长住高昌为国师,后求其次,结为兄弟。留玄奘讲经一月并相约归来时住三年后,玄奘才在麴文泰为其置办了“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四,手力二十五人”后离开高昌国的。

② 《大唐西域记》卷一记“(屈支即龟兹)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见《大唐西域记校注》54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③ 杨廷福《玄奘年谱》119页,中华书局,1988年。

④ 叶护(Yabghu)即汉朝时翕侯的异称,是匈奴、大月氏、乌孙、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官职称号。西突厥中叶护一职多由王族阿史那氏宗族子弟担任。

⑤ 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麴文泰)遣殿中侍御史史欢信送至叶护可汗衙。……又以绫绢五百匹、果味两车献叶护可汗,并书称‘法师者是奴弟,欲求法于婆罗门国,愿可汗怜奴如怜奴,仍请敕以西诸国给驿落马递送出境’”。玄奘与叶护见面后,“更引汉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国书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悦,令使者坐”。几天后,“可汗乃令军中访解汉语及诸国音者,遂得年少,曾到长安数年通解汉语,即封为摩拙达官,作诸国书,令摩拙达法师到迦毕试国。又施绀缕法服一袭,绢五十匹,与群臣送十余里”。叶护可汗即西突厥可汗,又译统叶护可汗。《旧唐书·突厥传下》5181页记其“勇而有谋,善攻战。……霸有西域……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